

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

徐 斯 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三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自從中國大陸採取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其自身的變化和發展就一直與整個世界的變化與發展密不可分。自九〇年代以來，隨著經濟活動與科技在全世界的快速發展，在國際社會中掀起了一股所謂「全球化」的浪潮。這股浪潮一方面衝擊了中國大陸與世界既有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快速地改變了中國大陸對世界及其與自身關係的認知圖像。這種衝擊與認知產生了交互影響的作用，衝擊影響了原有的認知，而認知的重新調整又產生了對衝擊的調整，進一步回頭改變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關係。

本文一方面大致介紹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觀點，另一方面著重討論分析其中不同觀點之間的對照與意涵。本文以美國學者赫爾德（David Held）等所整理出之對全球化的三種觀點，即「全球化進步論」、「全球化懷疑論」、和「全球化轉化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兩組理論分類架構來區別並觀察中國大陸學者在各種不同全球化議題上的觀點。本文之討論所涵蓋的全球化議題包括：「經濟全球化」、「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全球化與國內政治改革」、「全球化與中國大陸對外關係」。此外，本文也提到從若干外國學者眼中，對中國大陸之全球化觀點的一些觀察。

簡言之，本文認為在中國大陸學者中，一方面對全球化的觀點有一些共通性，但也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多元性，並且不乏針鋒相對的辯論。根據此一觀察，本文最後將大陸學者這種對全球化的多元觀點，導向對兩岸關係的思考，嘗試從中國大陸此種多元觀點中找出對兩岸關係另類思考的可能。

關鍵詞：全球化、國家主權、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兩岸關係

* * *

一、導 言

自從中國大陸採取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其自身的變化和發展就一直與整個世界的變化與發展密不可分。隨著改革開放的漸次展開，中國大陸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

上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期在國際上的對外關係也得以大幅提高。中國從調整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也取得了新的利益，並且也發展了新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隨著此一情勢的開展，中國大陸逐漸加深了其對國際的參與和瞭解，同樣地也讓國際更加地認識自己並更密切地與自己交往。自九〇年代以來，隨著經濟活動與科技在全世界的快速發展，在國際社會中掀起了一股所謂「全球化」的浪潮。這股浪潮一方面衝擊了中國大陸與世界既有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快速地改變了中國大陸對世紀及其與自身關係的認知圖像。這種衝擊與認知產生了交互影響的作用，衝擊影響了原有的認知，而認知的重新調整又產生了對衝擊的調整，進一步回頭改變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關係。

以上述的動機與觀點出發，本文的目的一方面在大致介紹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觀點，另一方面著重討論分析其中不同觀點之間的對照與意涵。本文中所分析的中國大陸全球化的觀點，其實大部分的還是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選擇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作分析有幾點原因：首先，在中國大陸，對全球化之觀點表達得最多、最有系統的，恐怕還是學者；其次，學者的觀點可見諸於各種學術刊物及書籍，比較便利於蒐集；再其次，學者們的觀點最前沿、最多元、彼此之間的對話性高，有利於較深入的分析；此外，從兩岸關係而言，學者與學者之間意見的交流往往是對現行政策突破的先聲，按照國際關係「建構論」（constructivism）學派的說法，學者間的對話所構成的「認知社群」（cognitive community）往往成為改變政治現實的動力來源。因此針對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進行分析有利於將來兩岸學者間的進一步交流。

本文分為十個段落：首段為導言；第二段針對國際關係學及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對「全球化」的若干分析的理論做一簡要介紹，做為本文後面討論的參考架構；第三段到第七段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學者對全球化中某些面向的觀點做個別分析，第三段分析中國大陸學者觀點下的經濟全球化；第四段分析中國大陸學者觀點下的全球化與文化；第五段分析中國大陸學者觀點下的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第六段分析中國大陸學者觀點下的全球化與國內政治制度；第七段則分析中國大陸學者觀點下的全球化與中國對外關係；分析完了中國學者對全球化各議題的看法，第八段則分析西方學者眼中，中國大陸對全球化之觀點為何；奠基於前述的分析與檢視，第九段本文則就中國大陸學者的全球化觀點提出一些觀察與分析；最後一段則從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觀點出發，略談全球化對兩岸關係的意涵，並提出本文在全球化的思考下對兩岸關係一些新的構思與建議。

二、對「全球化」的一般理論觀點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個在最近一、二十年逐漸被炒熱的一個研究課題，其實早在六〇、七〇年代「羅馬俱樂部」的研究報告就已經開啟了以全球角度研究世界人類所面臨之共同問題的一種分析視角^①。然而自從全球化的概念出現以來，

註①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二。

對此一概念所涵蓋的範圍、此概念定義的方式、其影響之所及、和對其認知的角度等，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辯論，就如許多其他重要的社會科學概念一樣，尚處在未定於一的情況。而且看來只要這個全球化的過程一天未停止，這樣的歧異就一天不會消失。為了討論的方便，本文採用以下兩組對全球化的定義。第一組是赫爾德等學者所提的定義方式②。根據赫爾德等學者的定義，全球化所指的是：

「具有以下特質的一個（或一組）轉變過程，此過程表現為：一種全球各種社會關係和社會交換行為之「空間組織方式」的轉變；此種轉變可以用『廣度（extensity）、密度（intensity）、速度（velocity）和深度（impact）』等面向來予以衡量；此種轉變會在跨洲際、跨區域間引起和造就各種活動、互動、和權力支配之流動與網絡。」^③

這一組定義比較抽象，但也比較精練。他抓住了幾個重點：首先、全球化是一種過程；其次，全球化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再其次，全球化有四個不同的向度；最後，全球化的結果是跨洲際和區域的流動與網絡。

第二種是根據韓裔美籍學者金淳基（Samuel Kim）的定義，他的定義相較起來雖然稍微較冗長，但卻也比較具體。他以下面這樣的方式定義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一連串複雜、彼此獨立、卻又互相有關的變化過程；此一連串之過程擴張了、加深了、並加快了全世界各層面之人類關係和接觸的相關聯性，這包括了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環境的、政治的、外交的、和安全的等各層面；這種變化過程使得在世界某處的事件、決定、和行動對世界上另一處的個人、團體、和國家都會產生立即的影響與後果。」^④

這組定義的優點是點出了全球化的（七個）不同層面，並強調在全球化趨勢下世界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相影響及關聯性。

如果從政治科學的傳統出發，有哪些理解或分析全球化的理論觀點和視角呢？依照赫爾德等學者的分析^⑤，有關全球化的理論可以分為三大派：

1. 「全球化進步論」（hyperglobalist thesis）：第一派是全球化進步論者。對全球進步論者而言，人類世界將步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紀；在此世紀中國家的權威將衰落，其重要性將不再；世界在全球資本主義和科技的驅動下形成一個全球市場，隨之而來的是全球治理與全球的公民社會；全球原有的政治階層（如南北之位階）將銷蝕，全球將共享同一化的文明，人類社會將達到同一的和諧。

註② Held, Davi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 Jonathan Perraton, eds.,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England): Polity Press, 1999).

註③ Held, et. al. (1999), p. 16.

註④ Kim, Samuel (1999),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3, no. 4, p. 17.

註⑤ Held, et. al. (1999), pp. 2~10.

2. 「全球化懷疑論」（sceptical thesis）：第二派是全球化懷疑論者。這些人認為，現今的世界並不是什麼史無前例的新時代，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恐怕還比步上一八九〇年代；國家並不僅沒有消亡，而且其權力和重要性可能更見提高，其仍是國際社會中最重要的行爲者和構成單元；全球化的驅動力仍然是國家與市場，而且既有的國際秩序不僅不會有本質的改變，而且南方國家邊緣化的程度可能反而會更加嚴重；所以全球化其實最多也只不過是一種國際化與區域化的過程，且這樣的過程是以民族國家的同意為前提所產生的；如此的過程其結果遠非是一個永久和諧的圖像，反而可能是更加劇烈的區域板塊或文明板塊之間的衝突。

3. 「全球化轉化論」（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第三派是全球化轉化論者，他們可說是前兩個極端立場間的一種妥協與調和。他們認為，目前的全球朝著相互關聯的變化過程，其密度之高、範圍之廣、速度之快、影響之深的程度，的確是史無前例的；這種過程的驅動力是一種混合的現代性力量，它不僅使得民族國家產生了一種自我重新建構和轉化的過程，而且連整個世界的秩序也在重新建構；然此種轉化的過程之未來，是朝向全球的整合或分散化，尚在未定之天。

表一綜合敘述了這三大派別的不同觀點和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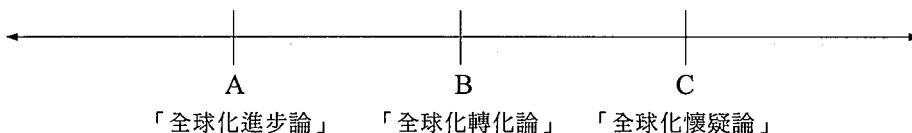
表一 全球化三種理論之比較⑥

	全球化進步論	全球化懷疑論	全球化轉化論
1. 標示性主張	全球化新世紀	貿易板塊；較從前更弱之地緣政治的管理	史無前例之高度的全球互相聯結
2. 最主要特徵	全球資本主義之實現；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會	世界的相互依賴程度實際上比1890年代要更低	密度高且範圍廣的全球化
3. 民族國家政府之權力	衰退或被侵蝕	增強或提高	重新建構與重新組成
4. 全球化的驅動力	資本主義與科技	國家與市場	現代性的混合力量
5. 全球秩序的分層化型態	世界原有之階層化秩序逐漸被侵蝕	南方國家之邊緣化更加地嚴重	一種重新建構之世界秩序的出現
6. 主題；主弦律	麥當勞；瑪丹娜	國家利益	政治社區的轉化
7. 全球化的概念形成	做為人類行動架構的一種重組	做為一種國際化與區域化的過程	做為一種區域間關係和遠距行動之間的一種重組過程
8. 歷史軌跡	全球文明之誕生	區域板塊/文明之衝突	尚未可知：全球性整合或分散化
9. 主要論點摘要	民族國家之終結	在民族國家默許與支持做為前提下的國際化過程	全球化轉化國家權力與世界政治

註⑥ Held, et. al., (1999), p. 10.

如果按照社會科學的用語，赫爾德等學者這樣的分類方法應該可以說是一種韋伯所提出之「理念型」（ideal type）的分類方法。現實世界中的具體現象未必只能對應出此分類中的某一種類型。很可能有些學者的看法是兼具其中兩種看法，譬如處在第一、三種之間，或第二、三種之間。不過，要同時間有「全球化進步論」和「全球化懷疑論」的論點恐怕就比較困難。所以如果將三種立場做為一個一為座標軸上的三點，如圖一我們可以標出三個立場：若以 A 點表示「全球化進步論」、B 點表示「全球化轉化論」、C 點表示「全球化懷疑論」，它們再一條直線上的關係應為 A-B-C。（見圖一）

圖一 對全球化立場的三分法



除了上述三種對全球化的理論觀點以外，在西方所流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中，還有另一組的三種理論角度，也有助於我們歸類與討論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視角。第一種是「現實主義」（Realism）傳統、第二種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傳統、第三種是「馬克思主義」（Marxism）傳統^⑦。「現實主義傳統」的分析多從國家的角度出發，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因此分析國際政治不可能脫離主權國家的國家利益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自由主義傳統」則強調市場在全球的國際政治經濟中的整合力量，此派理論在國際政治中喜歡強調非軍事的國際事務在世界政治中愈來愈大的重要性，以及國家對經濟活動干預所造成對經濟的不利。自由主義主張全球的經濟應該以無障礙的市場機制予以整合，國家和國家之間不應有貿易及其他經濟上的障礙。至於「馬克思主義」傳統則奠基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強調在國際政治經濟中所存在的剝削和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往往是存在於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或者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或不發達國家之間，且此派理論也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才是國際政治經濟的基本動力，也是一切問題的來源。不看清楚這一點，就永遠不能改變存在於國際間的剝削與不公。

如果我們將對全球化的三種論點與上述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三個理論派別做一個交叉的分析，便可以得到表二的結果。在此表中可以見到，「全球化進步論」基本上是與自由主義有著較強的關聯，但與現實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沒有太大的相關；「全球化懷疑論」的看法則通常是奠基於現實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與自由主義無關；「全球化轉化論」的觀點則可以與三種理論傳統都有關，不過它與自由主義的關

^{註⑦}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5~64;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五二三~五三八。

聯顯然應比與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聯要強。當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角度去主張全球轉化論時，可將之視為全球轉化論的不同次分類。譬如可能有「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轉化論」、「現實主義的全球化轉化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轉化論」等。

表二 全球化三種理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三種理論的關係

	全球化進步論	全球化轉化論	全球化懷疑論
自由主義	✓	✓	✗
現實主義	✗	△	✓
馬克思主義	✗	△	✓

✓：強相關；△：弱相關；✗：不相關；

三、對經濟全球化的觀點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對於全球化的認知還是從經濟的全球化開始。對於經濟的全球化，大致而言中國大陸學者有以下的一些共同的看法。

首先，一個普遍的看法，是認為全球化是一個不因主觀因素而移轉的客觀事實、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是一種不可扭轉的歷史潮流^⑧。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將世界的經濟當作一種超越國與國的經濟關係來看待，也就是採取一種全球的角度來觀察，基本上來說，這種觀點內涵的一種邏輯應該是一種非現實主義論的觀點。這麼說的原因是因為這種歷史潮流的方向是一種任何國家、團體、個人都不得不跟上的一種趨勢。在這場歷史競爭的洪流中，誰能學會新的規則而跟上誰就能得益，誰不能則誰就倒楣。而且，這股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不是哪個國家故意起的頭，更不是誰想要停止就能停止的。由龍永圖部長具名編輯、汪道涵先生具名為高級顧問、由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所出的幹部讀本《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中就很清楚地採取了這樣的觀點。在分析全球化出現的原因時該書說到：「全球化不是國際組織設計出來的，也不是哪些國家領導人倡導的，它主要由企業推動，是從下至上的一種微觀經濟行為。」^⑨如果哪個國家要採取一種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計較與其他國家相較之下的「相對得益」（relative gain），覺得順著全球化反而划不來，那麼它可能反而喪失了歷史的時機。某種程度而言，經濟全球化的出現相當符合馬克思主義所分析的一種客觀歷史定律。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可以說既然全球化「是一種在歷史上能產生作用的力量，則它必然符合歷史本身演化的邏輯。」（Was ist wirklich ist das Vernunftig.）這也難怪上述的世貿組織

註⑧ 王輝，「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面臨的問題與對策選擇」，江漢論壇，一九九九年第二三一期，頁六七~六八；談世中，「中國：如何面對經濟全球化」，經濟管理，一九九八年第二二九期，頁六；王連喜，「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一五二。

註⑨ 龍永圖編，《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二五八。

幹部讀本中也花了十二頁的篇幅專門論證了「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和趨勢」^⑩。

由這種認識的角度出發，中國大陸的部分學者產生了一種危機感，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如果無法迎接這樣一種挑戰，則有可能被「開除球籍」^⑪。若是基於這樣一種看法，那麼積極迎接這樣的挑戰恐怕便是一種唯一的結論，如果還爭論要不要迎接這種挑戰是浪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大陸的學者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歧見。不過，究竟應該如何迎接挑戰，則仍然有不同的意見。這在本節稍後會討論。

此外，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也認為經濟全球化雖然是不可扭轉的歷史趨勢，但是它卻是充滿著風險的；中國大陸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雖然應該要積極參與經濟的全球化，但同時也一定要加強「經濟安全」的觀念，以免在還沒有從經濟全球化取得好處之前就被其風險擊垮^⑫。當然，中國大陸的學者會有如此想法，是與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是分不開的。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學者還有一種對經濟全球化的普遍看法，那就是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兩面刃」的看法。許多學者都以一種「悖論」或「二律背反」的論證形式指出，經濟全球化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譬如說前面已經說過的，經濟的全球化一方面唯有參加才能從中得利，但另一方面卻也充滿了風險；此外，它一方面可促進發展，但另一方面卻會造成某些國家團體個人對另一些國家團體個人進行掠奪剝削，因而造成愈發地不均與不公^⑬。

但中國大陸的學者間對經濟的全球化也在若干問題上仍存有不同看法。首先，對於經濟的全球化是否就等於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有著不同的意見。王連喜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當代資本主義確實出現了很多新的特點，但是，資本主義的擴張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全球化或全球化走向資本主義。」^⑭此外，薛曉源在綜述「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研討會」的論文中也指出，與會的代表一致認為，「全球化並不必然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是一種「多元並存、多種模式共生

註⑩ 龍永圖編，前引書，頁二六七～二八〇。

註⑪ 謝君九，「關於全球化的思考與討論」，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前引書，頁一三〇～一三一；楊朝仁、韓志偉，「全球化、制度開放與民族復興」，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前引書，頁一四六。

註⑫ 汪道涵，「全球化、東亞模式、中國經濟」，《世界知識》，一九九九年第一二八二期，頁八；陳旭、尚文程，「經濟全球化的“陷阱”分析——兼談我國政府的對策」，《經濟問題》，一九九九年第二三四期，頁二三～二四；李克穆，「關於經濟全球化進成的幾點認識」，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前引書，頁四五；王朝才、傅志華、隆武華，「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安全」，胡元梓、薛曉源編，全球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一八〇～一九一；趙振華，「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安全」，《國際貿易問題》，一九九九年第二〇〇期，頁一二～一五；Wang, Yizhou (1999), "New Security Concept in Globalization," *Beijing Review*, Feb., pp. 15~21。

註⑬ 吳江，「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前引書，頁一七；劉力，「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後來居上的必由之路」，胡元梓、薛曉源編，全球化與中國，前引書，頁一四四；談世中，前引文，頁七。

註⑭ 王連喜，前引文，頁一五〇。

的局面」^⑯。而相對地，也有完全相反的主張。譬如紀玉祥則認為，「當代經濟全球化實質上是在當代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全球化問題實際上也是當代資本主義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的問題。」^⑯宿景祥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進程，因此它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⑰。此外也有學者乾脆認為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的當前形式，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別稱。」^⑱有的學者認為後面這種認為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觀點是一種「新左翼」的系統性觀點，並批判地認為這種觀點是一種意識形態^⑲。這個爭辯的意義在於，中國大陸要如何面對這個經濟全球化？因為如果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那麼中國是否要堅持不變成這個資本主義的一部份？若採取了這個觀點，那麼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就必然會有所保留，甚至可能對融入採取否定的態度。

第二個中國大陸的學者間對經濟全球化存有爭議的議題，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是否應該對世界市場更加開放，尤其是面對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中國能逃過亞洲金融危機）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很難做一個非常清楚的劃分界線，只能說學者們的一些基本態度有所不同。許多學者站在一種經濟現實主義的立場，認為因應經濟的全球化應該從加強本國經濟的角度出發，對完全的開放採較保守的態度^⑳。如王朝才等學者就主張，「對外開放的程度應當與民族工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相適應，充分考慮民族工業對國際競爭壓力和承受能力，絕不能危及民族工業的生存，不能損害民族工業自主發展能力。」^㉑若是不損害民族工業自主發展的能力，恐怕就必須採取一些保護的手段，如此對融入世界化的程度就須有所限制了。但是真正來說，對外開放就不可能不面對競爭，而面對競爭又不能不冒著某些國內企業因競爭不過而被淘汰的命運。所以又要開放，又要絕不損害民族工業，可說是不太可能的。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的全球化雖是一種趨勢但不必是一種目標，「任何國家或實體均無義務遵照某種規則參與這一進程。」^㉒因此若是「將（經濟）全球化看成是一種目標，並把一系列國際協約和規則與其直接聯繫起來，統而言之地劃定出一條中國的國際化發展道

註^⑯ 薛曉源，「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研討會綜述」，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前引書，頁二八五。

註^⑰ 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戰略與管理，一九九九年總三十四期，頁九七轉述紀玉祥，「全球化與當代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註^⑱ 宿景祥，「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民族化問題」，現代國際關係，一九九八年第九期，頁一三~一四。

註^⑲ 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頁九七，轉述王振逢，「全球化、文化認同和民族主義」，王寧等編，《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九一。

註^㉑ 汪丁丁，「面對“全球資本主義”中國向何處去？」，戰略與管理，一九九九年第二期，頁一一二~一一三。

註^㉒ 王朝才、傅志華、隆武華，前引文；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頁一〇一~一〇二；周光春，「“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評析」，當代思潮，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頁一一~一四；黃燁菁，「把握二十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主線——“經濟全球化與我國改革開放”研討會綜述」，社會科學，一九九五年第五期，頁一五~一九。

註^㉓ 王朝才、傅志華、隆武華，前引文，頁一八九。

註^㉔ 李克穆，前引文，頁四四。

路」，那將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很大的誤解^②。

相對地，也有許多學者主張一種較開放、參與、融入的態度。譬如說學者趙輝認為中國面臨全球化不僅要「全」而且要「深」^③；汪道涵認為，「經濟全球化進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堅持改革開放和保持穩定則是中國發展的基本條件。」^④此外，他還說，「經濟全球化則為中國提供了歷史的機遇。中國成為吸收外國直接資金最多的地方…中國經濟加入世界市場的過程，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過程。實施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已經確立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基本策略。」^⑤此外，在外經貿部的幹部讀本中也間接地採取了這樣一種較融入的態度，該讀本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國必須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發展趨勢」，在此趨勢下「各國都必然會融入世界市場之中，…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經濟全球化使各國不可能閉關鎖國，…因此一國要善於利用各種人類文明成果發展生產力、獲取全球化的利益。」^⑥對於加入WTO，中國大陸的政府官員也一再論證其對中國大陸而言已是一種重大的國家戰略選擇，順著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方向，中國大陸已沒有其他的選擇，必須要融入國際的主流^⑦。

四、對全球化與文化的觀點

全球化除了是一個經濟過程之外，也是一個文化的過程。尤其是在這個過程中，尚在形成中的「全球意識」與民族主義會產生怎樣的關係呢？所謂的「全球意識」或「全球文化」其內涵為何？由誰主導形成？這對於中國大陸這樣一個新興中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最近幾年中，因為諸如南斯拉夫領館被炸事件等各種主客觀因素，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同時又要面對這個全球化的趨勢，而且在此趨勢下西方國家每每運用全球化文化價值的語言指控或攻擊中國大陸，使得中國大陸內部對全球化與文化價值的關係產生了熱烈的討論。

首先，中國學者很清楚地辨明了一個認識上可能產生的誤區，那就是「全球化不等於全球性」。全球化指的是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而全球性所指的是一種靜態的狀態。承認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並不是說在此演變過程中的國家團體或個人就一定已是處在具備全球性的狀態^⑧。然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此全球化是否是一

註^② 李克穆，前引文，頁四四。

註^③ 趙輝，「全球化與中國的命運」，開放，一九九九年第一五五期，頁五六。

註^④ 汪道涵，前引文，頁一〇。

註^⑤ 汪道涵，前引文，頁一〇。

註^⑥ 龍永圖編，前引書，頁二七三～二七五。

註^⑦ 龍永圖，「加入世貿組織融入國際社會主流」，國際貿易問題，一九九九年第九期，總二〇一期，頁一～一〇、三〇；龍永圖，「中國“入世”重大意義和影響等同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經濟導報週刊，一九九九年第四十七期，頁四；龍永圖編，前引書，頁三〇五。

註^⑧ 王連喜，前引文，頁一五一；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頁一六；楊中芳，「現代化、全球化是與本土化對立的嗎？～試論現代化研究的本土化」，社會學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七十九期，頁六五。

個朝著一個一致單一的「全球性」演化的直線式過程呢？一個國家民族是否應該擁抱「全球文化」的出現呢？全球文化與民族文化的關係為何呢？

中國學者在此方面有幾類不同的看法。一類學者認為，強調全球化的一體化而認為民族主義或民族文化不再重要並不是一種公平的看法。譬如學者俞可平認為，「把全球化僅僅視為一體化和同質化過程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片面和不適當的，是缺乏對全球化過程的辯證性質的認識，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就很可能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⑩這類觀點不僅認為不應太擴大解釋全球化的同質化傾向，而且還認為在全球一體化迅速發展下，文化的異質化或民族主義的傾向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可能變得更活躍起來。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往往刺激民族國家一種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回應，這是一種階段性合乎邏輯的反應。全球的經濟一體化或許較容易，但文化的融合卻是極其困難的，在必須面對進入「現代的門檻」時，各民族原先的支撐物和社會結構突然崩潰，這使人充滿了壓力與痛苦但又不可避免。因此如何保持自己民族國家本色而不被全球化吞噬是當前民族主義的一種普遍心態^⑪。這在理論上似乎較偏向於在文化問題上對全球化的一種懷疑論。也是從這樣一種角度出發，有些學者會主張，其實所謂的全球化很難免的就是一種西方化或美國化，而所謂全球文明的形成很難不受到西方或美國的影響^⑫。

相對而言，另一派學者則強調全球化的一種共同性、一體性。學者李慎之的立場，最能表明這種類似「全球進步論」的觀點：「今後，一個民族最大的光榮是在全球價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額。全球化的未來將是全球價值形成並發揮主導作用的局面。」^⑬學者譚君久則主張，「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人的社會化過程全球化了，此種過程於是形成了一種『地球文化』。在這種地球文化下的社會化過程，使得一個人首先成為一個地球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巴西人等。…一種全球文化並不僅是將會產生，而是已經存在了。但承認人類的共同價值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不同民族和主權國家的存在，但為了整個地球的生存和發展，所有的地球人都必須接受和創造某種共同的價值觀、正義觀。在這個問題上人類應該要進一步克服思想上的僵化。」^⑭在這樣的觀點下，民族主義便顯得落後、危險、甚至不文明。

學者們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特別針對在中國大陸國內某些強調「中國特色」或「中國中心論」的聲音提出了批評。譬如蘇東斌指出：「我們在強調『中國特色』的同時，必須清醒認識到，努力吸收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果實與營養。…許多的東西並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見，更多的則可以融會貫通。相反，拒絕接受文明，則是野蠻與落後的象徵。」^⑮楊東雪與王列則針對中國中心論做了以下的觀察：

註⑩ 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二一。

註⑪ 張西山，「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二四六～二五一。

註⑫ 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

註⑬ 李慎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及其價值認同」，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一五。

註⑭ 譚君久，「關於全球化的思考與討論」，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一三二～一三三。

註⑮ 蘇東斌，「中國社會發展的全球化趨勢」，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六七。

「要特別強調一點，中國在加入全球化進成的過程中，一定要警惕『中國中心論』的抬頭和蔓延。『中心論』是逆全球化過程的，必然會被全球化的深入所淘汰。現在有一些人…正在鼓吹『中國中心論』的論調，這種盲目自大的表現有著極大的危險，它不僅會影響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形象，而且會阻礙中國更深入的改革和思想解放。」^⑩

最後一類，就是可能比較接近「全球化轉化論」的一種觀點。轉化論的學者認為，全球化過程在文化方面的意義，最主要是一個各民族、各文化透過自我變遷自我改造，與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明互相互動的一個過程。學者何萍說：「全球化是一個過程，它給人類文明發展的內在機制注入了一種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能力，是人類文明的再生和發展。」^⑪由此種全球文化與各個民族文化交相辯證演進的互動過程看來，在全球文明這一巨系統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每一個別的制度體系要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它本身就應該是「開放式」的，而不應該是「封閉式」和「排他式」的^⑫。如果從這樣一種辯證的、自我轉化的角度出發，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是，什麼是一個民族文化上應該轉化的內容與方向？從一個很總體的角度而言，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都會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既要批判「西方中心論」，也要警惕狹隘的「中國中心論」傾向^⑬。學者何萍對這個論點有更具體的論述。何萍將全球化運動分為兩個時期，從文藝復興以來，全球化的第一個時期已經展開，一直到了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帶來了科學技術的革命與世界革命，並展開了全球化的第二個時期^⑭。根據這樣對全球化運動的歷史區隔認為，何萍進而認為，在全球化運動第二個時期形成的反歐洲中心論思潮，是各民族文化復興的一個契機，也是世界新文化的創造與再生。中國的第二次開放，也是一種文化的再生與創造，但中國文化的批判與創造任務是有兩重的：一重是批判本世紀以來統治中國人的歐洲中心論的思維方式，但另一重任務是要轉變由採取原有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模式所積澱的價值信念。批判歐洲中心論，就是要從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近代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中解脫出來；而轉變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模式的價值理念，則是要改變一種舊的社會意識，因為原有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模式是奠基於自然經濟之社會基礎，而伴隨著此社會基礎的是一種非民主的小農意識。而順應全球化，就是要改變由這種小農意識所衍生出的缺少自主性、獨立性、缺乏個體性和民主性的文化內涵^⑮。

五、對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觀點

全球化的第三個問題是全球化與主權國家的關係。此一課題的中心議題是：究竟

註^⑩ 楊東雪、王列，「關於全球化與中國研究的對話」，胡元梓、薛曉源編，前引書，頁二〇。

註^⑪ 何萍，「全球化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一二一。

註^⑫ 楊朝仁、韓志偉，前引文，頁一四二。

註^⑬ 薛曉源，前引文，頁二八六。

註^⑭ 何萍，前引文，頁一一三～一一五。

註^⑮ 何萍，前引文，頁一二四～一二五。

全球化是否會削弱民族國家的主權？民族國家的主權在全球化的時代仍然重要嗎？如人權等全球普遍的價值應該高於主權嗎？

首先，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完全採取「全球化進步論」的中國大陸學者並不多，有若干學者是採「全球化懷疑論」的，不過絕大多數還是採取中庸之道的「全球化轉化論」。許多學者都承認全球化有侵蝕、削弱、制約國家主權的作用，如學者汪永成便很具體地指出，經濟全球化是通過「向上轉移」和「向下轉移」削弱了國家政府的權力。所謂向上轉移是指像超國家一級的國際性組織（如歐洲聯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有形或無形的權力轉移；而向下轉移是指向國家的中央政府以外的團體單位（如地方政府、企業、人民團體等）的權力轉移。此外，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內的資本、國外的資本、與國家之間利益交錯的複雜三角關係，也使得國家的自主性受到影響^②。學者付小隨指出，對國家主權概念的理解，應該是越來越多地體現在經濟方面，而不只是政治與外交方面。全球化與國家主權是存在矛盾的。傳統民族國家的概念在現實中已經體現出了可分割性，這已經破壞了最初的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概念^③。

對於全球化的這種侵蝕分割主權的趨勢，也有若干中國大陸學者持著一種接近「全球化懷疑論」的保留態度。這些學者大部分有著很強烈的「現實主義」的傾向。這種從現實主義出發的觀點，很容易得到對全球化趨勢作某種抵抗的想法。譬如一種比較強烈的意見認為，全球化是在世界仍處於「民族國家時代」的條件下形成的一種趨勢，「主權」概念沒有過時，國家民族利益仍是最高行動準則。且現在乃至今後相當長時期，國家主權問題仍將是南北國家間鬥爭的焦點，發展中國家應毫不動搖地、理直氣壯地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基本立場。全球化其實並沒有西方渲染得那麼快，發展中國家仍有迴旋餘地，可以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研究和採取相應對策^④。另一種比較緩和的意見則承認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進程，並也認為在此進程中國家與國家的互動在日益密切，國家的主權是受到了越來越大的限制。然而這種意見仍不脫現實主義的核心觀點，即主張世界體系在本質上可以說仍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聯合國從來沒有成為一個世界政府。在可見的未來，雖然在諸如國際貿易、生態保護、以及運輸通訊等方面的人類行為會更加有序，但就主權國家的政治關係而言，世界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肯定仍將繼續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⑤。此外，學者趙旭東也提出了一個更具體的分析，他認為在全球化之下的新技術革命固然一方面對國家的主權產生了削弱和制約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這種削弱和制約的作用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不平衡和不均等的。因此，一方面國家面對著主權的削弱，希望並需要讓渡部分主

註② 汪永成，「試論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行政管理的影響」，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二二六～二二九。

註③ 付小隨，「從歐盟看全球化過程中國家主權和職能的轉移現象」，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一六九～一七〇。

註④ 肖楓，「怎能一個“接軌”了結——發展中國家與經濟全球化」，世界知識，一九九九年第一二八五期，頁二九。

註⑤ 李少軍，「論安全理論的基本概念」，資中筠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一四九。

權以實現全球法治化和有序化的理想，但另一方面，新科技所造成國與國之間主權現實上的更加不平等恰恰使上述的這種理想難以實現^⑯。

不過，在此一問題上，中國大陸學者較明顯地傾向於採取「全球化轉化論」的中庸之道的路線。學者俞可平的看法足為代表，他說全球化是一種整合，是一體化，它具體表現為國際組織的增加，尤其是跨國組織的作用前所未有的增大；國家間的整合程度極大地提高，以致於國家間的壁壘和國家主權，在相當的程度上開始消解。但與此同時，各國家與民族的地方性和獨立性也同時加強，形成一種「全球化地方主義」^⑰。而從全球化轉化論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轉化」的問題。在談到民族國家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嚴峻挑戰的問題時，有學者主張制訂正確的國際競爭戰略方式才是根本因應之道。這種看法認為，民族國家政府管理經濟活動的能力高低直接關係到本國參與全球化的收益大小。民族國家可以在本國經濟最大承受力的基礎上尋求開放程度最高的與世界市場的結合方式，策略性地參與全球化，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限度的收益。簡言之，「積極的民族主義」立場、而非盲目的擁抱全球化，才是民族國家參與全球化的理性選擇^⑱。

另一個重要的「轉化」問題，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一個國家對其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之理解應該如何轉化的問題。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國家對安全利益的考慮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們已經不得不從本國原有之安全和利益的單純角度之外，去思考跨國性和全球性的因素是否也會影響到其自身的國家安全和利益。換句話說，面對著全球化所隱含的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特性時，國家有時必須採取維護全球利益的做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也必須考慮如何將眼前的安全與利益同長遠的安全與利益結合起來。在全球化之下，國家只有更新觀念，更全面考慮自己利益的各方面，才能真正得到安全^⑲。將此種觀念的轉化講得最透徹的，恐怕要屬學者王逸舟了。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一個國家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一定要採取一種願意自我轉變的、開放的、和進步的新安全觀；而是否能真正採行這種新安全觀，則取決於該國家自我改造、自我創造、與自我開放的能力和程度。這種自我改造、創造、和開放的，不僅是在所謂的「器物層面」（physical aspect），更必須深及該國的「體制層面」（institutional aspect），甚至「觀念層面」（ideal aspect）^⑳。更具體地說，王逸舟指出了中國目前所有的三種需求或三種利益，分別是「主權的需求及利益」、「發展的需求及利益」、以及「責任需求及利益」，而此三者之間卻又不是沒有矛盾的。如何在這三種利益與矛盾之間取得平衡與互利，可說是中國大陸面對全球

^⑯ 趙旭東，「新技術革命對國家主權的影響」，資中筠編，前引書，頁二八三～二九四。

^⑰ 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頁二二。

^⑱ 鄭樹彬，「機運與挑戰：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國家的兩難抉擇」，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二三九～二四二。

^⑲ 李少軍，前引文，頁一六八～一六九。

^⑳ 王逸舟，「樹立世紀之交的國家安全觀」，瞭望新聞周刊，一九九九年第三十七期，頁二三～二四；Wang, *op. cit.*

化的潮流下，在二十一世紀最主要的外交課題^①。

在民族國家與全球共同價值的關係上，也是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爭執熱點之一。譚君久認為，承認人類共同價值觀，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不同民族和主權國家的存在。主權國家依然是國際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主體。但人類共同的利益，應該是高於民族國家之間價值判斷的差異。談超越意識形態、超越社會制度的人類共同文化和價值觀，本身就是承認了不同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存在^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王逸舟這樣一位在主權觀上主張「自我進步改造論」的學者，對於主權與人權這樣一個敏感棘手的議題，也並不接受單純的「人權高於主權」的觀點，而是以一種較辯證的方法予以論述。他說，「人權必須要有主權來保障，由主權國家來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所講的『人權高於主權』是荒謬的。但反過來說，我們不能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主權對人權沒有關係。主權是要尊重受主權保護的、其管轄範圍內的所有民眾的權利，通過自己的體制、政策，使所有的人心情舒暢，各有所為。」^③不過相較於官方的標準說法：「中國有十二億多人口，社會生產力仍不發達，必須首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中國人民主張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緊密結合」^④，王逸舟的這種所謂「兩點論」的說法至少顯得比較細膩，如果做為一種政策制訂所根據的原則，聽起來也比較具有說服力。

六、對全球化與國內政治制度的觀點

如果我們再次引用對全球化觀點的三類分法，則可以將中國大陸學者對於全球化與中國大陸國內政治制度改革的觀點分為：「全球化進步論」、「全球化懷疑論」、和「全球化轉化論」。當然，這種分法難免有失之武斷之處。但是這種分類無論如何還是有助於我們做一種對照性和較細膩的分析。

從「全球化進步論」的觀點出發，各國的政治制度應該朝向一種趨同的制度去發展，而中國大陸應該也不例外。以自由主義論點著名的學者劉軍寧，其觀點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代表：「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說是民主化的同義詞」「全球化的無形動力是價值的一體化，民主政治與全球化價值的一體化。」^⑤簡言之，他認為「政治全球化」=「全球政治價值一體化」=「民主化」。在中國大陸，政治體制和政治價值的選擇，一直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問題。目前官方的說法是認為中國不搞西方國家

註^① 王逸舟，「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衡」，戰略與管理，一九九九年總第三十七期，頁一八～二七。

註^② 譚君久，前引文，頁一三二。

註^③ 王逸舟，「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衡」，頁二四。

註^④ 江澤民，「在“九九財富全球論壇－上海”的講話（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經濟導報周刊，二〇〇〇年第二六四〇期，頁二～三。

註^⑤ 劉軍寧，「全球化與民主政治」，胡元梓、薛曉源編，前引書，頁六八。

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如果從「全球化進步論」的觀點出發，恐怕會得到不同於此論的一種看法。以學者蔡拓的觀點為例，他認為人類政治制度的發展具有共性。共和制、代議制、選舉制、制衡機制、文官制度等絕非資產階級國家的專利，而是人類政制長期演化、選擇的結果。專制的、個人的統治形式必然要遭到歷史的淘汰，而代議制和與其伴隨的選舉制的遍及全球，都是有其內在的事務發展規律的，不能不加以重視^{⑤6}。學者何萍的全球化二階段論更清楚地點出中國現有政治體制的問題，以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全球化的關係。何萍認為，中國在其順應第二波全球化的第二階段的改革開放中，其政治體制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改變在第一階段中與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下其政治體制的那種「單一和封閉」，而應取代以能與全球化趨勢相適應的「開放的」政治體制，而此種政治體制是建立在公民自主、自立、自覺的民主意識之上的^{⑤7}。與此論點相類似的，是學者楊朝仁和韓志偉的主張，他們認為一個民族在全球化的潮流下要能繼續發展進步而達到民族之復興，就必須採取「開放式」和「吸納式」的制度，而不是一種「封閉式」和「排他式」的制度^{⑤8}。而經濟領域內的制度開放，最終必定會要求政治領域內的制度性開放，儘管政治制度的開放無疑要比經濟制度的開放困難得多。他們更清楚地表示，隨著全球化的日漸加速，各民族國家在致力於其政治的發展時，就必須維護、遵守和促進諸如民主、平等和人權等等全球共同的政治性的價值標準，因為它們是經過人類共同實踐的檢驗和考驗的^{⑤9}。

關於全球化如何具體地衝擊國內的政治制度方面，黃衛平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普及的衝擊下，世界範圍內在政治結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諸多領域都在發生並即將發生極其深刻的革命性變化。這些全球化的衝擊將原有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改變成爲網絡式的自主橫向聯繫，從而在技術上支持了人的自主選擇權利，並使那種傳統的僅由少數「政治精英」壟斷信息，推行「愚民政策」的政治體制完全喪失其可能^{⑥0}。他並認爲，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多還侷限在行政體制方面，尚未深入到國家權力結構體制的層面。他建議除了現行所進行的機構改革外，還應加強包括處理執政黨與國家關係法治化以及廉政建設在內的更多政治改革措施^{⑥1}。

和這種論點有較大差異的另一些論點，可以歸類於「全球化懷疑論」。他們比較強調政治全球化未必意味著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一定要與西方的現行制度同一化。政治全球化的實現可能是在更高更抽象層次的一些政治價值上。以學者孫津的看法為例，作為「政治全球化懷疑論」的一個代表，他就是從執政黨的合法性的角度切入。他首

註^{⑤6} 蔡拓，「全球問題的哲學思考」，胡元梓、薛曉源編，前引書，頁二五四。

註^{⑤7} 何萍，前引文，頁一二二～一二五。

註^{⑤8} 楊朝仁、韓志偉，前引文，頁一四二。

註^{⑤9} 楊朝仁、韓志偉，前引文，頁一四五。

註^{⑥0} 黃衛平，「全球化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五〇。

註^{⑥1} 黃衛平，前引文，頁五八。

先指出做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其合法性與西方國家的執政黨不同。他舉列寧的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奪取政權為結束的，而社會主義革命則以奪取政權為開端。」他認為雖然西方國家的執政黨在結構上和功能上所具有的品格正是西方國家的執政黨樂於自我標榜的東西，也是全球化的政治特徵之一，然而社會主義革命黨品格的積極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他主張並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社會主義執政黨應該放棄其革命黨的品格，或者說需要轉變成西方那樣的執政黨。但他也認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要提高其功能的有效，不能是外加的，只能來自某種合法的結構。孫津承認，這是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他也承認，就全球化的背景而言，中國共產黨在結構和功能上與西方國家執政黨的不同合法性，曾經是造成冷戰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他的結論卻是，這麼說並不意味著中國的政治改革存在著一個執政黨的合法性須與國際「接軌」的問題，不過他所指出的解決方案卻也頗為模糊，他認為「由功能而結構的體制改革本身正在為執政黨的合法性給出新的含意。」^⑫

最後一類，可能也是較多學者所採取的論點，比較是一種「轉化論」的論點，其所側重強調的是要選擇正確的自我轉化，並強調全球化的最終方向乃是與各個國家的具體轉化過程互動的。一九九〇年代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可以說是為中國大陸喚醒了面對全球化的一種急需轉化的危機意識。學者們的反省發現，東南亞危機帶來的不只是經濟的經驗教訓，更重要的一點，可能反而是政治改革與社會穩定的問題。學者王逸舟認為，「政治改革既包括政府的一些策略和方針的反思與調整，也包括政治體制的不斷改革和完善。…其內容應包括…使政治權力受到更多必要的監督與制約，使政府工作的動作更加透明。」^⑬在談到因應金融風暴的更具體改革時，王逸舟也不忘將它與國內的政治制度連結起來。「中國的銀行改革與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分不開的，因為所有銀行幾乎都是官辦銀行…政府與銀行業關係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問題。」^⑭關於具體地應如何自我轉化，學者們也有不同的側重焦點。徐勇與曾峻指出了「契約化」做為中國未來政治朝向全球化發展的一個切入點，主張中國大陸應以契約為中軸重構有關制度的關係、結構、和功能，進而形成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和精神相一致的政治構造，如此方能真正與國際接軌^⑮。轉化論的另一種觀點是，同意政治的全球化的抽象目標，但對於政治全球化是否應簡單地等同於接受西方既有一套政治標準提出了折衷的看法。如學者蘇東斌認為，我們要肯定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一體化過程。在此前提下，他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關係到所有改革最終是否能成功的關鍵，我們不能再天真地認為經濟繁榮會自然而然地帶來政治上的清廉，要認識到在全球化潮流下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蘇東斌指出，一個國家發展必須關注其自身特殊的歷史時間與空間，但任何「中國特色」並不是「特」在既定目標上，而僅僅能夠「特」在具體道路上。也就是說，他的觀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

註^⑫ 孫津，「全球化與體制改革」，胡元梓、薛曉源編，前引書，頁六二。

註^⑬ 王逸舟，「全球化過程與中國的機遇」，胡元梓、薛曉源編，前引書，頁四三。

註^⑭ 同前註，頁三九～四〇。

註^⑮ 徐勇、曾峻，「全球化、契約與政治展」，學習與探索，一九九八年第一一五期，頁七二。

革的確是朝著全球政治發展一體化的方向前進的，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制度創新」的方式完成，因此既非「全盤古化」，亦非「全盤西化」^⑯。

七、對全球化與中國對外關係的觀點

做為一個新興中的發展中世界大國，中國大陸與世界關係的安排與選擇，一方面不僅深深地關涉著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另一方面，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也關涉到區域的乃至全球的發展與前途。在這個問題上，同其他的問題類似，中國大陸學者的意見也有一定程度的分殊。

首先，從一種較接近「全球化進步論」的角度來看，不少中國大陸的學者強調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應朝向融合的方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則應朝著合作的方向來發展。當然，這樣的看法是奠基於它們對於全球化對整體國際關係的判斷上所發出的。譬如學者張蔚武和馬磊即指出，全球化信息社會的產生，使知識成為經濟體制的中心資源，國家因此不再像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時期那樣對領土即附屬於土地的資源有強烈的要求。這一點改變了土地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也使得以土地爭奪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理論必須被超越，代之而起的是所謂的「智緣政治」。所謂智緣政治，是指在信息社會中，各國視智力資源為國家實力最重要的構成要素，致力於人才的培養和爭奪，通過知識的競爭來謀求其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優勢地位^⑰。另外，外經貿部的幹部讀本中也指出，經濟全球化促進世界多極化發展：經濟全球化與開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互動並行，而開放的經濟區域主義又促進了世界多極化的形成和發展^⑱。學者蔡拓則認為，在全球化之下國際關係的主旋律已經發生變化，非軍事化的國際關係內容明顯增加、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顯著增強、國際衝突也開始讓位於國際合作^⑲。此外也有學者強調，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中所佔的重要性愈來愈低，相對地，所謂「軟權力」的文化成為國家利益構成的亮點，也是國際關係中國家影響力的新要素^⑳。

基於這樣的一種觀點，蔡拓主張，對中國而言必須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已經達到極限，而是尚未適應全球化的要求，尚未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因此，進一步解放思想，更加自覺地融入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的交流與合作才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主旋律。對於國際規則，發展中國家感到大國制訂、安排、控制規則的不公正，固然是一種無奈；但也必須看到，以國際規則取代大國霸權畢竟還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歷史進步性。所以中國應該改變對抗性的政治思維，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積極主動地介入並參加國際規則的建構與實施^㉑。

註^⑯ 蘇東斌，前引文，頁六九～七三。

註^⑰ 張蔚武、馬磊，「信息社會：超越地緣政治」，資中筠編，前引書，頁二六九～二七〇。

註^⑱ 龍永圖編，前引書，頁二九一～二九六。

註^⑲ 蔡拓，「全球化與當代國際關係」，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七九～八〇。

註^㉑ 丁志剛，「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利益的認證與維護」，胡元梓、薛曉源編，前引書，頁五四。

在談到全球化對國際關係中南北關係所產生的影響時，學者劉力主張以南南合作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來取代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行的。歷史的實踐已經可以證明，這種南南合作的區域一體化對促進經濟發展的益處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雖然說各國從全球化的過程中所分得「蛋糕」的份量的確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的份額在短期內是分得較大，但絕不能就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只有利於發達國家而不利於發展中國家，更不能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發達國家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工具。如果發達國家不能掌握機遇，從積極參與中求得生存與發展，那麼其結局只能是停滯甚至滅亡^⑦。

相對於以上對全球化必須積極參與、努力融入的觀點，另外有一些中國大陸學者的看法傾向於有所保留，大致上較接近於「全球化懷疑論」的看法。譬如說，趙旭東認為，國際關係的運作仍然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動力，「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思想還遠不能成為各國決策者的指導思想，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利益之爭仍是國家主權領域內爭吵和鬥爭的實質內容。所以，當發達國家以實現國際社會的法制和秩序為理由，要求發展中國家出讓部分國家主權以保證國際合作時，其實是以一種理想為幌子，並以此為干涉它國內政的堂皇藉口，但真實的意圖卻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權益來促進自己的利益^⑧。類似的觀點還有，學者吳江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它一方面固然可以使發達中國家吸取新科技、新文明，並帶來發展的機遇，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為不發達地區或發展中國家帶來新的經濟霸權的現實威脅，損害其國家主權的和經濟正常的發展。他認為，如果不看到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⑨。李克穆也認為，如果要達到全球化理想預期中之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並解決在全球化進程中因不同國家社會制度之巨大差異所引起之混亂現象，國際組織的能力和作用是重要的基礎條件；但是今日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全球的作用仍然相當有限，所以在全球化的國際關係中，不應該掉以輕心，在外部環境中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尚未完善之前，堅持從國情出發制訂獨立的發展戰略仍是必要的^⑩。

如果照這種邏輯來思考，中國實不應太輕易地接受已發達國家藉全球化知名所加諸的一些標準，因為這樣等於是屈服於這些國家的霸權、且對中國自己是危險的，可謂是損己利人的不理智行為。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觀點中有很強的現實主義色彩。

當然，就如在所有其他問題一樣，仍然有一批學者從較折衷的轉化論的角度來看待在全球化之下中國與其他國家和世界的關係。學者譚君久的看法，可做為這種觀點的一個開頭。他指出，對於國際慣例，問題已不在於是是不是接受，而在於怎樣接受。在接受國際慣例的同時，也要成為制訂國際規則的參與者；你首先得參與，而不是排斥^⑪。學

註⑦ 蔡拓，前引文，頁七九～八〇。

註⑧ 劉力，前引文，頁一四三～一四五。

註⑨ 趙旭東，前引文，頁二九二～二九三。

註⑩ 吳江，前引文，頁一八。

註⑪ 李克穆，前引文，頁四五～四七。

註⑫ 譚君久，前引文，頁一三〇。

者李少軍的分析表明，面對全球化下國與國之間交叉複雜的關係，一個國家應意識到它已經不可能是一完全獨立的行動者。李少軍表示，以國家之名處理的任何事務，包括國家內部事務，實際上都變成了國際社會大舞台上的活動，都會立即牽動國際互動網絡，引起國際反應。所以，國家謀求安全，不可能是純粹的單一國家的行為，而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國際色彩，從而構成國際安全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國家的任何不安全問題通常都不是自身一個國家的問題，而且這樣的問題也不是單獨一個國家所能解決的。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也是互通的^⑦。

王逸舟則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切入，也有類似的分析。他的看法是，在全球化之下，一個國家的安全與鄰國的安全、周邊地區的安全乃至全球範圍的安全均有一定互利關係。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國際上要求重視全球性共同利益和「人類整體安全」的呼聲日益強烈，從所謂「綜合安全」的角度觀察，最大難題在於協調各國的自主發展與全球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⑧。所以說，關鍵在於如何協調這種矛盾。不過，即使李少軍有這樣的分析，他還是認為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並不是一回事，在概念上仍應區分「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其中國家安全仍處於較重要的位置，只不過談國家安全必須是或者說其實是在研究如何在國際安全中維護促進國家安全的問題^⑨。

面對全球化，轉化論更重要的是強調應如何正確選擇自我轉化的對策上。在有關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具體對應策略上，王逸舟認為中國大陸應該謹記鄧小平的遺訓，就是避免與美國的強勢交鋒，應該要慎思明辨，在既有的國際規則裡，哪些可以從容處置，哪些必須謹慎對待；哪些是可以而且應當改變的，哪些是應當改革但難以做到的；哪些是屬於短期內不得不服從而長遠看必須挑戰的，哪些是屬於短期講會有碰撞但長遠看對大家均有好處的；哪些是因為他國霸權的因素而顯得不在道理，哪些是由於我們自身結構的缺失而易於造成的摩擦；哪些是可能變化的，哪些是指應當加強的，哪些是必須服從的^⑩。

八、西方學者認知下中國大陸對全球化之觀點

研究中國外交與對外關係的權威學者，韓裔美籍的金淳基（Samuel Kim）指出，東亞國家一般對全球化的觀點是比較不採取「全球化進步論」的觀點，而比較強調如何加強國家的角色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但另一方面，整體而言，它們也並不傾向於採取一種「（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主張國家仍一如既往地重要，或全球化並不如西方所言的那麼重要。不過很有趣的是，金淳基特別指出，對於後面這一種論點，恐怕中國大陸是唯一的例外^⑪。也就是說，他認為當大部分東亞國家採取了一種類似轉

註⑦ 李少軍，前引文，頁一五三。

註⑧ 王逸舟，「樹立世紀之交的國家安全觀」，頁二四。

註⑨ 李少軍，前引文，頁一五三。

註⑩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前引書，頁四五。

註⑪ Kim, *op. cit.*, pp. 25~26.

化論的立場時，中國還比較停留在基於現實主義的立場而對全球化採取一種較保守的態度。其實，關於中國大陸學者中這種普遍的現實主義觀點，中國大陸優秀的國際政治學者王緝思也承認，「中國學者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持批評態度，但它們的觀念同西方傳統現實主義有許多相通之處。」^⑧英學者 Michael Yahuda 對中國的這種濃厚的現實主義傾向也有其具批評色彩的看法，他說中國的對外關係中總是存在著一種「說的與做的之間的差距」。中國對外的外交方針總是強調友誼、平等、互惠、互不干涉等原則，但是其實際上的外交行為卻又總是充滿了超乎一般濃厚的現實主義、以及缺乏透明度的色彩。他說，但若你去看中國的外交政策語彙，你卻絕對不會覺得權力和利益的算計是中國領導人外交政策的主要思維^⑨。

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看法，金淳基總結認為有兩個比較值得議論的觀點，一個就是上述所說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觀點基本上還是一種「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c)的觀點，第二則是認為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理解比較侷限於「經濟全球化」這個單一的面向。不過有趣的是，他也特別說明，他認為中國社科院的王逸舟是個例外。他說王的觀點打破了全球化只是經濟全球化的這個看法，而且它還提出了一種新的安全觀^⑩。

此外，在全球化與國際關係的議題上，金淳基說中國特有的一個觀點是認為全球化可以導致或有助於產生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他認為，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當面對一個無法逃避的全球化趨勢時，嘗試著建構一種因果關係的論點，將全球化與（一種較符合中國所希望的）世界秩序多極化作一種因果的連結，這樣似乎比較能自我說服去擁抱全球化^⑪。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也有類似的觀察，他認為面對全球化的新的國際秩序，中國嘗試炮製出一種「全球民族主義」(global nationalism)。摩爾基本上是以分析中國大陸領導人江澤民在不同國際場合的談話後所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中國大陸對全球化的看法是要以參與國際化來達到建設一個富強偉大的中國，而具體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堅持既有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的方針，並且加大自我改造的力度，以做好準備，中國唯一的選擇是積極加入全球化這場充滿了風險和機會的賽局，否則只有被淘汰一途^⑫。

Michael Yahuda 則指出，中國大陸在尋求一個全球角色的過程中，似乎是被夾在兩種力量的拉扯中。一方面就是很強的民族主義力量，此種民族主義使得中國大陸在一些有關全球規則的價值上與美國和西方起了針鋒相對的衝突；但另一方面則是想要融入世界經濟的力量，使得中國又必須與美國和其他鄰邦維持一個好的關係。由於這樣的一種兩難的處境，Yahuda 的觀察認為中國大陸在全球中所扮演的是充滿了「不確定的」(uncertain) 和「困惑的」(confused) 一種角色^⑬。

註^⑧ 王緝思，「以兩手對兩手——對中美關係的若干戰略思考」，新華文摘，一九九九年第十期，頁二九五。

註^⑨ Yahuda, Michael, "China's Search for a Global Role," *Current History*, Sep. 1999, pp. 267~270.

註^⑩ Kim *op. cit.*, p. 27.

註^⑪ Kim *op. cit.*, p. 28.

註^⑫ Moore, Thomas G.,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23, no. 4, 1999, pp. 88~93.

註^⑬ Yahuda *op. cit.*, p. 270.

在這裡本文想稍微再特別討論一下的，是 Michael Yahuda 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分析，他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能反應某種西方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應值得參考。Yahuda 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有一種「西方的受害者情結」（the West's victim）。當然，這種情結是來自中國過去一兩個世紀以來與西方強權接觸時所留下的痛苦記憶。但是，他說中國的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往往並不傾向於探討過去為何沒有成功地回應西方的挑戰，而傾向耽溺於一種受傷害的民族情感。這使得中國總是有一種想要尋回那失落的榮譽與尊嚴的情緒^⑧。

其實，中國大陸的學者中也不是沒有人對於民族主義有所反思的。其中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時殷弘教授的分析和批評可算是相當鞭辟入裡。時教授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激情支配的心理狀態，是一種激發大眾愛憎、造就大眾理想的信念，但是他同時指出，民族主義卻也蘊含著非理性和暴力衝突傾向。對於民族主義這種非理性的成分，時教授認為很大程度是因為民族主義存在於「民族國家」的概念中，如果把民族和國家混同起來，認為每個民族都須組成唯一一個國家，或國家只有在僅僅並完全包容單獨一個民族的情況下才具有合理性，那麼這在理論上是非常偏狹和荒謬的，在實踐中勢必也會大大增加民族主義蘊含的非理性和破壞性^⑨。時教授進一步指出，基於民族主義出發的「民族自決」必須與國際正義與國際秩序取得協調，由於民族主義經常蘊含強烈的暴力衝突傾向，其權利要求往往意味著巨大的生命犧牲和後果深遠的國際動態，就更增加了對它們做道德判斷時權衡正義與秩序的必要性。所有民族和國家都應避免道德上的偏激，道德判斷的適度是政策的一個先決條件。追求民族主義的尊嚴必須與其所對各方人民所造成的苦難和其所導致的國際動盪做一權衡^⑩。時殷弘教授的這番論析，在今日面對全球化浪潮的中國大陸，可以說是非常成熟、具有反思力、而又有深刻見地的。

九、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觀點之特色

綜合以上的分析，本文發現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看法有一些共同的特色。第一種很特殊的看法，那就是認為全球化本身是一種「悖論」，或者用一種比較通俗的說法就是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兩面刃」、或「雙刃劍」^⑪。這種說法的出現我相信是與中國大陸學者所受傳統辯證法思想訓練是有關係的。最明顯被提出這種悖論說的就是由俞可平與黃衛平教授所編的《全球化的悖論》一書^⑫。經過整理，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

註^⑧ Yahuda, *op. cit.*, p. 268.

註^⑨ 時殷弘，「民族主義與國家增升級倫理道德思考」，資中筠編，前引書，頁三九。

註^⑩ 時殷弘，前引文，頁四八～四九。

註^⑪ 汪道涵，前引文，頁八；李長久，「經濟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對策」，《世界知識》，一九九九年第一二八二期，頁二〇；談世中，前引文，頁六；鄒樹彬，前引文，頁二三六；黃樺青，前引文，頁一六；Wang, *op. cit.*

註^⑫ 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

化的這種悖論，可以表現為許多組的悖論關係。首先，俞可平教授整理出了四組的悖論關係^⑩：

1. 全球化是單一化與多樣化的統一（universalization/polarization）；
2. 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說一體化和分裂化的統一（integration/fragmentation）；
3. 全球化是集中化與分散化的統一（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4. 全球化是國際化和本土化的統一（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

除了這四點以外，本文經過整理認為，在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觀點中，還普遍存在有大約以下幾組的悖論關係：

5. 全球化是機遇與挑戰的並存（opportunity/challenge）；
6. 全球化是競爭與合作的並存（competition/cooperation）；
7. 全球化是共同發展與分配不均的並存（growth/inequality）；
8. 全球化是和平與衝突的並存（peace/conflict）；
9. 全球化是開放互賴與自立的並存（interdependence/self-reliance）；
10. 全球化過程中在一方面得到的愈多再另一方面可能失去得也愈多（more gain / more lose）。

從這十組的悖論關係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國大陸學者對於全球化的一種「欲迎還拒」、「愛恨交織」的情感。當然，這是與中國大陸目前具體的特殊國情有關的。總的來說，若是從赫爾德等學者所舉之三種學說類型來看，上述中國大陸學者這種「全球化悖論說」的看法似乎比較接近「全球化轉化論」的立場，也就是一種比較中庸的看法，因此，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觀點已漸趨成熟。

本文認為，中國大陸學者的第二個對全球化的共同看法是對全球化這樣既是一個「大機遇」也是一個「大挑戰」的趨勢的回應。總的方向而言是，中國必須參加全球化這場賽局；但是他們也深刻意識到，這場賽局與從前的賽局不同之處，那就是如果稍一錯過歷史時機，或是稍一選擇錯應對策略，其後果往往要比過去還來得嚴重。所以中國大陸必須要參與，而且要很小心地參與，既要懂得保護自己，又要設法發揚優勢。在這點上，本文較同意湯瑪斯·摩爾的「全球民族主義」的分析和金淳基的看法，也就是說中國參與這個賽局的一種出發點，基本上還是一種以傳統現實主義觀點來應對全球化挑戰的觀點。不過，本文要指出的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國大陸至少在學者當中所存在的多元觀點。本文與上述西方學者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是，本文嘗試從各種不同的理論角度出發，強調中國大陸學者之間觀點歧異的一面。在經過以議題分類、以不同的理論視角為座標，本文的分析已經觀察到，於大陸學者之間對全球化仍存在著許多多元的看法。雖然本文同意，現實主義的傳統和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國際觀仍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大陸學者的全球化觀點，使得對於每一個全球化的議題都有傾向全球化懷疑論的觀點出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已經有若干中國大陸學者在面對全球化的

註^⑩ 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頁二一～二四；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頁九八。

浪潮時，也開始有深刻的反省，持著接近全球化轉化論觀點的中國大陸學者也大有人在。譬如，一種超越單純現實主義的看法就是，不少學者很明白地指出，中國不僅不能逃避參與全球化這個賽局，而且愈是參與了這個賽局，愈是會被這個賽局的邏輯給牽著走，其玩法與考慮就會跟著改變。聰明的學者甚至已經認識到，這樣下去中國如果要在此賽局中獲勝，則她就不能不改變自己過去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也不能不改變自己過去對自己的認知，所以也應該重新界定本身新的「國家利益」及「國家需求」之內容^⑨。只不過，如果按照表二的分類，許多中國大陸學者的全球化轉化論仍然還是有著相當的現實主義色彩，甚至馬克思主義色彩，我們或者可以將之視為一種比較保守的全球化轉化論。

十、從大陸學者之全球化觀點看兩岸關係

正如中國大陸傑出的國際政治學者王逸舟所說的，當我們「議論全球化的話題…，我們也在改造自己，在重新按照符合新的時代特點的方式塑造做為人類的自我。…尤其是，[科學和真正的思想]可能改變長期形成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改變自己頭腦中那些曾經自以為是的東西和改變人類自己的生活方式。」^⑩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覺悟，本文最後要將對全球化的討論引到對兩岸關係的分析與前瞻。

兩岸關係其實在許多方面都與全球化有著相似的特點：譬如說，兩岸關係雖然痛苦，但對兩岸而言它都是一個不能不面對的客觀事實；兩岸關係過去與未來的發展也是一個充滿危機又充滿機遇的過程；如果參與此過程的各方能夠合作，著眼於大的共同利益，捐棄眼前短期狹隘利益的誘惑，則它可以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如果此過程之最終能朝向成功，則它必是一個多贏的局面，而絕非是一個零和的遊戲；但若要成功達成此目標，則兩岸都必須將之視為一個開放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勝出的方法並不是消滅對方、吃掉對方、欺騙對方，相反地，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應該是如何朝著一個雙贏的目標來改變自己、努力改掉自己不適合潮流、不利生存、不利雙贏的毛病和習慣。其目標不僅是自我強大，還應該是與他方尋求合作、共同進步。

兩岸關係不僅有著與全球化類似的性質，更重要的是，本文認為，如果從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觀點來考慮兩岸關係，那麼似乎應該可以發展出一些不同的思考。正如大陸學者所說，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任何國家內部重大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不考慮到國際的影響，以及其解決與國際環境的互動。正式在此種觀點之下，本文認為兩岸關係應該在順應全球化的潮流下來尋求解決。無論兩岸最終如何解決兩岸關係，全球化的腳步不會因為我們任何一方的任何選擇而有所停滯。我們任何一方若因為兩岸關係未能妥善解決，因而使得自己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落後，別的國家也不會停下來等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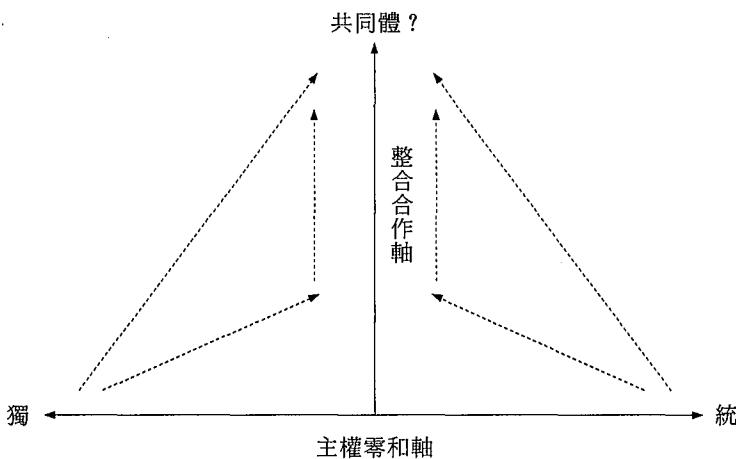
註^⑨ 王逸舟，「面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衡」；陳全生、劉婧華，「全球化的中國與世界（節選）」，戰略與管理，一九九九年總三十三期，頁二五。

註^⑩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頁四三～四四。

也就是說，無論兩岸關係的問題解不解決，或怎麼解決，中國大陸與台灣終究不能逃過要面對全球化的問題。全球化的問題無論從什麼角度而言，都是一個比兩岸關係更高位的一個問題。為了兩岸問題而拖延兩岸各自的全球化進程是兩岸的不智，若因此而阻礙或破壞了各自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機會那是兩岸的不幸。而如果在解決兩岸關係的同時，能夠不影響各自的全球化進程則是一種幸運，但這也只不過是一種中策；真正的上策，唯有兩岸設法在解決兩岸關係的同時，能夠也有利於甚至加速雙方共同的全球化進程。正如大陸學者自己的分析所指出，在全球化的今日，任何國家的行動與決定都已經不可能對國際沒有影響，相反地也不可能不受國際條件的制約。雖然世界上許多人對於國家主權的崇高與不可侵犯性仍有著一種神聖的情感，但是冷靜的分析與認知告訴我們，姑且不論這種情感是否有暴力的潛在可能，但此一情感的投射對象——「國家主權」——早已不是那麼至高而完整了。這麼說並不是在否定這種感情，但如果我們看清楚了全球化的趨勢，或許我們才能夠懂得把我們生命的能量從這種強烈但其對象卻已逐漸面目模糊的情感中解放出來，然後移到一個更高的、範圍更廣的、更加包容的一種目標上去。在這個目標中，一樣有情感的寄託，但那種情感是一種更開放更包容更互利的一種境界。這樣的一種昇華的感情，才能同時超越兩岸各自零和的一種主權爭議，以及各自圍繞在對其主權主張的一種排他的狹隘的情感衝突。

質言之，基於我們對全球化的瞭解，以及上述對中國大陸學者有關全球化各種觀點的分析，本文主張，事實上不難在兩岸的知識份子中找到一種共識，以一種「開放式的全球化轉化論」的觀點來尋求兩岸關係的解決之道。這種想法主張，兩岸的關係不是誰贏誰輸，而是雙方整合。但是整合的過程是一個雙方透過對話共同建構的過程。本文主張，兩岸關係的解決應跳脫主權的零和思考，如果我們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在主權上此種零和爭議，表現為在一條軸上尋找一個解決的點，此軸的一個極端是主張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另一個極端是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目前兩岸的問題就在於在這條軸上爭執不休。問題是在這條軸上尋找一個平衡點做為兩岸主權爭議的最終解決，不僅是不容易達成，而且最終是一種零和關係，在解決過程中必然要帶給人民災難。基於這樣一種分析，我們認為兩岸關係的解決，應該跳脫這一個無解的僵局，在此軸以外再拉出垂直的另一條軸出來。這個新的軸指向於兩岸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將兩岸的未來指向一種新的合作或整合的關係。這種合作或整合的遠景類似歐盟的形態，是從經濟和其他功能性議題著手，其未來所形成的政治形貌可能是一種「共同體」（Commonwealth），或某種類似歐盟的「新主權」架構。（見下頁圖二）本文將這種構想稱為「兩岸的建構整合論」，本文主張「以整合超越統獨」、「以合作代替對抗」。正如全球化一樣，整合已經打開了朝向一體化的大門，但是其過程又不致犧牲各自的自主性。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也是一個一旦開始就不太可能回頭的過程，關鍵在於，它是一種真正雙贏甚至多贏的解決方案。

圖二 「兩岸的建構整合論」示意圖



雖然以上本文嘗試以一種全球化的角度來構思未來兩岸關係的解決之道，但是本文也並不敢持一種太天真的樂觀。容我再次引用王逸舟的話，「以全球為基點的見解常常遭到利益驅動的強烈批評和抵制，研究者們常常被扣上『忽略國家利益』、『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主義者』的帽子。」⁶⁶每一個研究者經常在傳播追求「王道的」全球化理想過程中，會迎面遇到與「霸道的」大國或國際干預的衝突⁶⁷。但是全球化的趨勢正是使我們必須以一種自我轉化提升的方式，來超越各自狹隘的立場，以達到一種全人類共同的進步與一體化。中華文化中的理想——「世界大同」——的精髓正是這種最終方向的寫照。這也正是李慎之先生所說的，對於全球化中國人應有的貢獻，就是以一種「天下文化主義」，揚棄並超越狹隘的「沙文主義」，以彰顯一種「全球主義」⁶⁸。

本文對中國大陸學者在全球化問題觀點之分析發現，雖然中國大陸學者對於全球化問題仍然有一些國家主義、現實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情結，但是大陸學界中多元的觀點中也不乏具反省力的前瞻性觀點。兩岸關係做為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部分，台灣應該積極與大陸學界中有進步觀點的學者進行各層次的對話，以順著全球化趨勢的方式共同尋求解決兩岸關係的出路。

⁶⁶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頁四三。

⁶⁷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頁四三。

⁶⁸ 李慎之，「全球化時代中國人的使命」，東方，一九九四年第六期，頁二六。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Szu-chien Hsu

Abstract

Ever since adopting the open-door policy of reform, Mainland China's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have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ose of the outside world. Since 1990s,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bring the whole world more closely together.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as tremendously affected Mainl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and the discussion on globalization has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China's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and of itself.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d compares the perspectives that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have on globalization, seeking to find out the implications hidden in the debate among these different views. Th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 two set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 first, proposed by David Held and his colleagues, contains three gene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that is, the "hyperglobalist perspective," the "scept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ist perspective." The second is the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alism, liberalism, and Marxism. Based on these two set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on such relevant issues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reform," and "globalization and foreign relations." This article also includes observations made by some western scholars on Chinese perspectives of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commonalities among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there also exists an obvious plurality of perspectives on various issues regarding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is observation, the article applies this plurality of views on globaliza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proposes some alternative thinking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at parallel the logic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 globalization; state sovereignty;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Mainland China's domestic political reform; cross-strait relations